

吴伯箫原名熙成,当代著名散文家,一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最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一组回忆延安生活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有吴伯箫1961年创作的《记一辆纺车》和《种菜》(后改为《菜园小记》)两部手稿,保存于恒温恒湿的手稿库中。这两部手稿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捐赠,上世纪90年代初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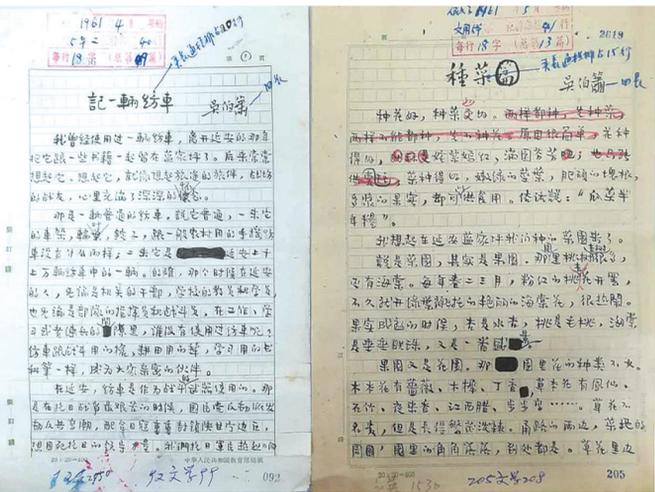
《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作为描写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性的剪影和片段,发声歌颂延安精神,弘扬依靠自己的双手,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发表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吴伯箫创作的初衷。

《记一辆纺车》手稿共8页,作者用毛笔书写于“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专用稿纸上。首页左上角盖有《人民文学》杂志的红色发稿印章,可以清晰看到“1961年4月”字样;末页尾部有完稿日期“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春节”字样。从整部手稿看,几乎每页稿纸上都有多处修改的痕迹,或添加或删除,作者都有明显的标识。尤其是删除的字、词、句,吴伯箫均用墨笔沿字的轮廓涂成方形,看上去非常工整,并在每页稿纸上标注了页码。

《种菜》手稿共7页,作者也是用毛笔书写于“20×20”灰格稿纸上。手稿的首页顶端盖有《人民文学》杂志的红色发稿印章,上有“人民文学1961年5月”字样;手稿末页有完稿日期“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字样。从印章上看,这篇文章应发表于1961年5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上,但笔者查看1961年《人民文学》杂志后得知,这篇文章实际上发表于1961年6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上,并更名为《菜园小记》。手稿中有红、黑两色毛笔修改的字迹,将修改笔迹作了比后发现,红色字迹不是吴伯箫的手迹,应为编辑的修改笔迹,而黑色修改字迹才是作者手迹。将《种菜》原稿与1961年发表于《人民

读吴伯箫1961年的两份手稿

□邱俊平



文学》杂志上的《菜园小记》作比较,发现内容有多处修改,从而判断这部手稿为初稿而非定稿。

笔者将两部手稿原稿与1961年《人民文学》杂志的刊发稿(以下简称“刊发稿”)作了比较,发现《记一辆纺车》和《种菜》虽创作并发表于同一年,但很明显,《记一辆纺车》原稿与刊发稿相比,修改得极少,只有两处添加了文字。而《种菜》的刊发稿却作了大量修改,汇总了一下,有20余处。整体来看,这次修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个别语句措辞的修改(包括题目),二是俗语、谚语的引用。一篇文章语言表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感情表达

的效果。本文拟对《种菜》原稿与刊发稿做一个比较,同时浅析修改的原因及其文学价值。现把主要异同点列举如下并加以说明。

标题:《种菜》
刊发稿:《菜园小记》
作者将作品名由《种菜》改为《菜园小记》,更富有文学色彩。
第1页 原稿:种花好,种菜也好。
刊发稿:种花好,种菜更好。
从原稿修改的痕迹中依稀可见,吴伯箫开始用的是“更”字。后改为“也”字,但在出版时又将“也”字改为“更”字。一字之差,“更”字能够在“好”的程度上再进一步,凸显了种菜的好

处。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反复斟酌推敲的,仅一个字反复修改,见证了作者创作时的思绪,修订时的考量。

第1页 原稿: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又是一番盛景。

刊发稿: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垂垂联珠的海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

原稿是“海棠是垂垂联珠”,而刊发稿改为“垂垂联珠的海棠”。笔者查阅了收录于《北极星》与《吴伯箫散文选》中的《菜园小记》,发现两部散文集又改为“海棠是垂垂联珠”,这样的语序与前文是一致的,读起来更顺畅。

第2页 原稿:在延安的人,大家都在工作。
刊发稿:在延安的同志,大家都在工作。

作者将原稿中的“人”改为“同志”,这样的表达把延安人民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这样的称呼更为亲切。

第3页 原稿:从石窠通菜地挑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

刊发稿:从石窠通菜地挖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

作者将原稿中的“挑”字换作“挖”字。挑,是多音字。读tiāo,有挑选,挑剔,挑毛病等词意;读tiào,有挑战,挑衅,挑拨,挑逗等词意。所以,“挑一条水沟”不符合日常语法。而“挖水沟”则更贴切。

第3页 原稿:出了九就能发出韭菜。
刊发稿: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菜。

在刊发稿中增加了“鲜绿肥嫩的”

修饰语,形象地描写了韭菜的良好长势,更好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延安军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第4页 原稿:为了积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来往牲口多的大路上拾粪。有一次,一位写小说的同志,出门没带粪叉,用手把新下的驴粪捧回来。要吃香的,就离不了脏的。”当时传为佳话。组织上请菜把式,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从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还留着深刻的印象。跟那些老师,我们学种菜,种瓜,种烟。

第6页 原稿: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芫荽在散发着脉脉香气;那时候人也会感到一种田园乐趣。
刊发稿: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芫荽在散发着脉脉香气;那时候,人也会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在“田园乐趣”前增加“真正的”这个定语,让人感受到作者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心情,把田园的乐趣、丰收的喜悦、劳动的诗情,凝练于“真正”二字上,让读者真切地体味到作者的情感,有着“言约而旨丰,辞近而意远”的意境。

中学时,笔者学过《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30年后,读到这两篇散文的手书原稿,倍感亲切。那些泛黄的纸页呈现了作者创作时的心绪;删删改改的字里行间,有书稿编辑与作者的原始共鸣;在创作与修改之间,手书文字与印刷铅字之间,映现着那个时代创作的缩影。

这一部分是全文修改最多的,有长短句的调整,也有句子的删减或增加。删去了“有一次,一位写小说的同志……当时传为佳话”以及“菜把式”等内容。加上了“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这句俗语,与前面增加的“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有了很好的呼

应,又能把大家收集肥料的现实性和劳动的热情表达出来。将“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来往牲口多的大路上拾粪。”这一长句改为两个短句,使文章节奏更加明快,干脆利落。除前面提到的两句俗语、谚语,《菜园小记》中还引用了大量的此类语言。这很大程度上或许取决于“文本”内容:作品着重在叙写种菜的乐趣,这样一篇充满“泥土气息”和“蔬菜清香”的文章,其语言特色似乎只有与其“土气”相符,才能更恰当地表达文章朴实的内容和淳朴的感情。这些来自民间的俗语、谚语,生动而不夸饰,朴实而有活力,自然亲切,平易晓畅。

模糊糊有个一知半解,对具体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吴伯箫此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开垦、基建,到工业、农业生产和畜牧,以至习武(训练)、文化教育的成绩,尤其是用了不少数字来体现这些成绩,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们每个战士,节约储蓄,加入军人合作社的,30元一股,常常有人入到30股40股呢。过中秋节,每个人吃到半个西瓜,三个月饼。”

《南泥湾》之外,同属于“建立革命家务”主题的尚有《“火焰山”上种树》《新村》两篇。“种树”介绍了靖边一位“爱树成癖”的“植树和卫生英雄”白云瑞,《新村》原题《徐义凯新村》,介绍的则是五个“受苦人”投奔边区石门关,齐心合力,开荒种地,揽工打短,几年之内建起了一个新村,其中徐义凯还因为突出的组织能力当选为“移民英雄”。吴伯箫写边区经济生产,角度新是一方面,写法的朴素、平实是另一方面,《南泥湾》还有着一些政治化、概念化的语言,《种树》《新村》就更加质朴,不加夸饰,写出了农民自身所具有的活力和智慧,令人信服。《种树》中很细腻传神的描

述:“他爱树也像爱人爱牲畜一样。栽种时选苗,选地,选栽种时令,柳树选那皮带嫩绿,没有斑点裂缝,没有黑心的头次落橡的栽子。因为苗嫩水分大,地干也能栽,埋的深浅,要看栽子的高低。山地鸡蛋形的低栽子比高栽子好。能载两季:春天清明前后(前10天比后10天好),秋天立冬冬前后(后10天比前10天好)。沙柳、毛乌柳、杨柳要压梢,梢是肥些嫩些的好。地挖尺把深,先撩老土,后填新土。白杨、青杨要带根刨,不带根栽不活。水桐高栽子顶上要留三四根细梢枝。椿树起坨都都(打苞发芽)再栽。桑树栽条子。榆树种榆钱(拣那熟透的,滚胖的)。桃杏种栽(要秋里种,春里种往往沤坏了不出)。月牙树多久也能栽。龙柏梢春上种,栽一棵活一棵……”这一段,简直就是是一部种树经,这显然是作者采访深入细致的结果,可也是作者本人农林知识积累丰富且对乡村经济富有感情使然。多年以后,作者在北京重写延安,犹有《菜园小记》那样充满田园风味的佳作,若没有这种乡土情感和田园经验做底子,那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建立革命家务……”
1943年,或许是吴伯箫一生中很难堪和痛苦的一年。年初,他在边区教育厅以“重大特嫌”遭到逮捕。接着,西安国民党当局在民众教育馆举行“追悼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二十八位文化名人”活动,目的是反共,被迫悼人员中也有吴伯箫名字。夏天,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职务被撤去,安排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名义上是学习,实际是“审干”的继续,遭受着空前的精神压力,到“鲁艺”等单位作“坦白”……
而《南泥湾》一文,也正是写于这年的秋天,发表于《解放日报》,原题为《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从容的叙述和乐观的调子,一点也不看出吴伯箫此时正经历着内心波澜。从延安文学角度言,《南泥湾》可能是至今评价不够的一篇开拓之作,不止是它首次正面、全面报道大生产运动的代表性和象征性之地“南泥湾”,还在于该文最早对南泥湾文化内涵作出了思考和提炼。文中表述:“这是建立革命家务。不剥削人,不敲诈人,用地利和自己底劳力,白手起家,大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没有!”又说:“八路军在南泥湾,生产还是次要的……它主要的还是整顿和教育。”“更真切地说:八路军生产、教育,解决供给,提高质量,更大的目标是为了战斗。”建立革命家务、整顿与教育、战斗,这些说法很能醒人耳目。
吴伯箫老年时期回忆:“去南泥湾参观,是中央党校第三部组织的。同行的记者有杨朔、艾青、马加、陈波儿、金肇野等六七位同志,或者还多一些。坐卡车。坐在卡车最后边的一路没说一句活的同志,后来知道是西北局的张秀山。那时没有自由主义,不必问的事不问,没有必要介绍的同志也不介绍。”“到南泥湾的当晚,王震将军就在窑洞门前接待了我们。”“在三五九旅两个团部都住过。南泥湾山上山下,沟里沟外,部队的班排生活出操、射击、生产,都见到了,参观了。在后,又像在前线;作客,又像在自己家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受,《南泥湾》所记的不过是万分之一。”(吴伯箫《南泥湾》的写作)

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一个重要标志的南泥湾,如今人们提起来只模

《黑红点》三题

□张欣

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摸索前进走得如何迟缓,并从而如所警策,期于今后继续努力而已。”这可能是本集最重要的标志意义,即标志着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一个自觉转向:自觉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要求写作。

对吴伯箫而言,这种政治方向的明确至少有几方面的力量促成: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听取毛泽东文艺讲话,1943年初“审干”遭捕及随后的党校学习。最终,政治上的“改造”带来写作上的“自觉”,《黑红点》之不同于《羽书》《潞安风物》,而又开启了以后的《出发点》《北极星》,尽在于此。

其二,《后记》又云:“11篇小文章,为什么还分作两集呢?不是故意小题大做,而是想区别一下文章的内容性质:一集写敌后战斗;二集写生产。”细看,前7篇是“敌后战斗”,又3篇是“生产”,最后一篇《孔家庄纪事》其实是写抗战胜利后张家口附近孔家庄以“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清算斗争、扶弱济贫”为内容的社会变革,或曰农民的“翻身”。

其三,《后记》第三段:“这些短文,除《孔家庄纪事》发表于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其余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几篇被别处的报纸或刊物转载过,加上另外六篇,也曾作为一个集子编入张家口文协分会主编的《长城丛书》,因此看到不易,遂另选一下,重印出来。”这里有两点:一是“其余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似不准确;二是“也曾作为一个集子编入……《长城丛书》”,如果这真是一个集子,那么《黑红点》单行本就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了,可惜这个集子目前找不到。

其四,1947年《后记》最后一段:“印这样一个集子,没有什么很大的目的:有一点意思的话,就是在表明一下听了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自己朝着为工、

当时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知道那篇东西的人就比较多。很多同志认为我在山东打过游击,大概就是从《一坛血》引起的。”这里“多方面采访”“从前方向延安才写出来”(听聊城专员谢鑫鹤同志谈的)云云,经细读原文和查阅资料,可判断为是1939年春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后、特别是1943年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采访相关人员而写作。因谢鑫鹤1943年11月后确有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而作品中的故事亦多发生于1940年前后,属于抗战中后期的事了,这与《潞安风物》有所不同。

写这组敌后斗争故事的1944年,吴伯箫正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故事性强、英雄形象、调子乐观,是这组故事的特点。

《黑红点》里说,所谓“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老百姓、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老百姓有那些坏人的名册,做好事名字下面点红点,做坏事名字下面点黑点,1942年有了根据点数“抗战胜利后算总账”的提法,故而那名册也被叫做“生死簿”。吴伯箫此文就围绕这生死簿讲述了若干个有趣的故事:老父亲到当伪军的儿子的炮楼前骂儿子,八路军优待转变了的伪军家属,对贪利和糊涂的伪军则以劝说、宣传、警告等方式“攻心”,警告也不奏效就“消灭他们”……此篇虽是重大题材,而写来笔调轻松,欢快幽默,表现的是民族性格中的大义和智慧,也看得出抗战中后期人民胜利信心的明显增强。

《打菱子》《游击队员宋二童》《化装》《文件》《调皮司令组》诸篇亦大致如此,无论是战斗小组,还是单独一个如宋二童,在具体的斗争中固然也有严肃和悲壮,而骨子里透出的却仍然是轻松、乐观和欢快。譬如游击队员宋二童的三个小故事,首先是用吹哨子迷惑日军搅乱了敌人的保卫计划,第二次是用一杆没有子弹的“独出子”枪截取了汉奸的“三八盒子”,第三次则是从敌人盘踞的县城追回了已停放在村里的脚踏车。“宋二童小伙子可真漂亮呵!身子发育得壮健结实,性情又明朗又爽快。”“真的,聪明、机智、勇敢,没叫宋二童失望。”——吴伯箫如此称赞他欣赏的年轻英雄。

比较起来,《一坛血》却是沉郁悲壮的。其中写了汉奸军队与日军合谋对闾庄抗日自卫队的疯狂报复,“男的被屠杀,女的被奸污”,“青年壮丁,都被用枪逼到东门外,那里摆了四把铡刀。没有审问,不要口供,凡是能使用枪的结实些的小伙子,都一律上了铡。腰腿两断,一连铡了82个。”也写了老百姓对这血海深仇的牢记:“葛富生老先生在那个最悲惨的日子里,瞅机会用一个白瓷坛

子装了满满一坛血,焚了香,磕了头,他把它放在葛家祠堂里。每逢初一、十五,他便虔诚地去祠堂看看,多皱的肃穆的脸上,每每是老泪纵横。”最后,老百姓迎来了八路军……

《一坛血》的故事,给读者心灵的撞击是强烈的,我最早读它,最受触动且留下最深印象处即是葛老先生以白瓷坛子装起满满一坛血这个场景。葛老先生这个人物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民族精神的深沉力量。

“这是建立革命家务……”
1943年,或许是吴伯箫一生中很难堪和痛苦的一年。年初,他在边区教育厅以“重大特嫌”遭到逮捕。接着,西安国民党当局在民众教育馆举行“追悼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二十八位文化名人”活动,目的是反共,被迫悼人员中也有吴伯箫名字。夏天,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职务被撤去,安排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名义上是学习,实际是“审干”的继续,遭受着空前的精神压力,到“鲁艺”等单位作“坦白”……
而《南泥湾》一文,也正是写于这年的秋天,发表于《解放日报》,原题为《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从容的叙述和乐观的调子,一点也不看出吴伯箫此时正经历着内心波澜。从延安文学角度言,《南泥湾》可能是至今评价不够的一篇开拓之作,不止是它首次正面、全面报道大生产运动的代表性和象征性之地“南泥湾”,还在于该文最早对南泥湾文化内涵作出了思考和提炼。文中表述:“这是建立革命家务。不剥削人,不敲诈人,用地利和自己底劳力,白手起家,大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没有!”又说:“八路军在南泥湾,生产还是次要的……它主要的还是整顿和教育。”“更真切地说:八路军生产、教育,解决供给,提高质量,更大的目标是为了战斗。”建立革命家务、整顿与教育、战斗,这些说法很能醒人耳目。
吴伯箫老年时期回忆:“去南泥湾参观,是中央党校第三部组织的。同行的记者有杨朔、艾青、马加、陈波儿、金肇野等六七位同志,或者还多一些。坐卡车。坐在卡车最后边的一路没说一句活的同志,后来知道是西北局的张秀山。那时没有自由主义,不必问的事不问,没有必要介绍的同志也不介绍。”“到南泥湾的当晚,王震将军就在窑洞门前接待了我们。”“在三五九旅两个团部都住过。南泥湾山上山下,沟里沟外,部队的班排生活出操、射击、生产,都见到了,参观了。在后,又像在前线;作客,又像在自己家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受,《南泥湾》所记的不过是万分之一。”(吴伯箫《南泥湾》的写作)

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一个重要标志的南泥湾,如今人们提起来只模

丛刊2018年第4期目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度优秀论文揭晓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
“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 …… 张旭东
“改造”与“转变”研究
“流动”的主体与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 …… 何吉贤
废名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与创作意愿的升沉 …… 冷霜
沈从文的土改书写与思想改造 …… 李斌
走出“书本上的马列主义”与实践观念的确立——建国初朱光潜的土改观察与思想改造 …… 金浪
周作人史料与研究
周作人1959年日记 …… 周吉宜
整理冰心与我祖父周作人的早期交往 …… 周吉宜
《春水》手稿后话及周作人、钱玄同、俞平伯的诗作、信札 …… 潘世圣
【日】中里见敬
日本新村对周作人之影响再议 …… 田中利康
作家与作品
逃亡即抗争:“立体战”与《火》三部曲的日常生活书写 …… 王琦
文本内部的日本——论陈映真小说中的殖民记忆 …… 赵牧
文学出版与传播研究
大势与人事:1949年后的开明书店 …… 邱雪松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方法问题——以《万象》的全部笔名分析为例 …… 邱晓丹
翻译研究
对奥登的另一翻译——论朱维基译《在战时》 …… 徐曦
论夏丏尊对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翻译 …… 颜淑兰
方玮德译文《略谈一九二五年后苏联作家的统一》校读 …… 付祥喜
综述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研讨会综述 …… 方爱武

主编:李敬泽 丁帆 邮发代号:2-667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投稿邮箱:ckjb@wxg.org.cn
电话:010-57311619/5731161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